

中国将在 2025 年变成发达国家 要承担更大责任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

编者按

9 月 16 日, 由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暨 50 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主题为: 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出席并演讲。其表示现在 85% 的世界上的人口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到 2025 年左右, 中国变成发达国家, 但到那时候还有 66% 的人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林毅夫认为,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 到 2025 年左右又是一个高收入国家, 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以下为实录。

中国经济学家 需深入了解中国现实

第一, 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家做了许多贡献, 中国两个百年目标的实现, 经济学家还要继续发挥作用。在 1978 年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按照世界银行的指标, 我们的人均 GDP 是 156 美元, 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20 年前, 50 人论坛成立的时候, 我们的人均 GDP 只有 850 美元, 还是低收入国家。经过 40 年, 每年 9.5% 的增长, 去年我们的人均 GDP 达到 8640 美元, 变成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 并且也是在过去 40 年当中唯一没有

编者按

在目前去杠杆的环境下, 释放流动性、决定流动性给谁, 是需要非常精准的, 这是央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必须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只有切实为企业尤其是民企减税、减负, 帮助其改善经营状况, 提高其盈利能力; 只有切实为一般劳动者减税、减负, 增加其可支配收入, 提高其消费意愿和能力, 流动性才能成为“有源之水”。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结构调整大刀阔斧, “三去一补”抓住了要害, 尤其是去杠杆, 应该说卓有成效, 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但从数据上看, 财政收入仍然保持了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经济现象, 尤其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

在目前去杠杆的环境下, 释放流动性、决定流动性给谁, 是需要非常精准的, 这是央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必须依靠市场自身的力量。只有切实为企业尤其是民企减税、减负, 帮助其改善经营状况, 提高其盈利能力; 只有切实为一般劳动者减税、减负, 增加其可支配收入, 提高其消费意愿和能力, 流动性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抓住本质, 厘清原理, 方有未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结构调整大刀阔斧, “三去一补”抓住了要害, 尤其是去杠杆, 应该说卓有成效, 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在长期快速发展之后所有的经济调整都是必要的也是正常的。从今年上半年的数据看, 稳中向好的判断应该是有依据的, 但经济状况亦有令人担忧处, 有一些指向性数据值得分析。

一方面,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都呈现减速。其中,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 18 万亿, 同比增长 9.4%, 低于预期和去年同期水平;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为 29.73 万亿, 同比增长仅 6.0%, 明确显示了当前投资的疲软; 贸易顺差收窄 26.7%, 说明贸易形势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7%, 低于预期, 实体经济的总体状况改善不明显。



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亮丽的成绩, 当然主要的是党中央国务院英明决策推动改革开放的结果。但我们作为经济学家, 也不断地给党中央国务院各级领导出谋划策, 我想也是有一份的贡献。

虽然过去 40 年的成绩很亮丽, 不过我们经济当中还存在各种问题, 包括像收入分配的问题、腐败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 并且距离两个百年目标想要达到的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强国, 还有很长的距离要去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样克服我们体制性的问题, 抓住时代给我们的机遇, 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同样需要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领导, 也需要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深入研究问题、出谋划策。这是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看法, 中国经济学家要做政策研究, 也要进行理论创新。固然, 如果只看我们自己国内的经济, 确实可以看到前面提到的很多问题, 不管收入分配、不管城乡差距、不管腐败等等, 但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改革是走的一个渐进双轨的方

编者按

另一方面, 财政收入却一路高歌猛进。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10.43 万亿, 同比增长 10.6%, 其中, 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99 万亿, 同比增长 13.7%;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44 万亿, 同比增长 8%。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为 9.16 万亿, 同比增长 14.4%; 非税收入 1.27 万亿, 同比下降 10.8%。很明显, 财政收入仍然保持了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经济现象, 尤其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

在本轮调整中, 调控措施和政策监管密集出台。2017 年开始, 各种紧缩政策纷沓而至, 直接的结果是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 9.1 万亿, 比上年同期减少 2.03 万亿。流动性急剧收紧带来一系列新问题, 各方连连叫苦, 社会信心也显得不足; 2018 年 2 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环比下降 1.72%, 6 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下降 3.82%。针对此, 近期政策措施又似有走向全面宽松的趋势。这又令人担心整个经济坠入“因热而紧, 因紧又松, 因松又热”的恶性循环。

目前, 要防止各种经济政策杠杆从全面紧缩走向全面宽松, 这仅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失去组合效能。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搭配上, 货币放水易, 忍痛减税难。面对国内外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 容易的老路子不一定奏效, 迎难而上才能驭风冲浪。

为什么经过六年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 尤其是去杠杆的有效措施之后经济总体状况没有进入良性发展轨道反而更加令人担忧呢? 依笔者观察, 这一轮调整过程中有几个认识误区导致了一些调控举措失当, 值得反思。

一、经济结构调整所释放的风险承担问题

人们一般认为调整结构是一种纠错行为, 只要判断时机准确, 措施针对有效就会带来巨大收益。其实, 经济结构调整是一种周期性的经济现象和治理规律, 而且任何经济调整都是以风险承担为代价的。没有承担的机制就无法实现调整成本的分摊与消化, 调整也是无法真正成功的或者反而会付出高昂的成本。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是对长期快

式, 政府保持了对市场进行太多干预所导致的结果。但是仔细去想的话也不完全是这样子, 比如说在 80 年代、90 年代, 同样同我们一样在进行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前苏联、东欧国家, 它们试图一致性地把那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引进到它们的国家。我想大家知道, 取得的结果是它们的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基本上我们存在的每个问题它们都存在, 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 还比我们更严重。所以并不是简单地讲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体制不完善导致这些问题, 并且在我们的改革经验当中也经常出现——有很多出发点非常好的改革措施, 从理论上讲非常清楚, 应该是好的, 但推行的结果常常是跟原来的愿望相反, 甚至把问题搞得更复杂。

那么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不可否认, 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 或者是世界上的这些发展机构, 总是以发达国家现有的理论跟现有的经验来看我们存在的问题, 希望用那些理论跟经验来作为我们改革发展的参照。但是我们知道,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理论的前提条件, 经验的适用性也决定这个经验产生的前提条件。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 前提条件当然跟发达国家不一样, 跟完善的、完整的理论模型不一样; 以那样的理论做参照, 经常会出现我们所讲的“淮南为橘, 淮北为枳”的问题。我们经济学家如果想对我们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推动中国的发展(有所助力的话), 非常有需要自己深入了解中国的经济现实, 从中国的经济现象当中去了解它存在的原因, 以及在克服它并可以动员的资源、推动改革前进的动力等(方面), 提出新的理论。

这样的理论能够比较好的让我们了解过去这 40 年的转型为什么能取得这些成绩, 同时还存在这么多问题, 这么多问题怎么来解决才会真的有效, 使我们的理论能够从认识世界跟改造世界得到统一。现在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 认识世界好像很有力量, 改造世界苍白无力。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中国的经济学家, 这场改革开放是人类经

结构调整与风险承担

■ 凤凰网财经研究院顾问、经济学博士、中国行为法学会金融法律行为研究会会长 朱小冀

速增长所积累的风险的释放, 某种意义上调整结构的过程就是实现风险的释放、转移、分摊和消化的过程。其核心是要避免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这就要求延长风险释放的时间窗口和切实落实风险承担问题。具体来说, 就是要稳定经济增长, 在发展中解决风险释放问题即实现风险的缓释, 且被释放的风险要被合理地真实承担, 这是在调整结构释放风险过程中应该树立的一个最基本观念。

结构调整过程中释放的风险不能被消灭, 就必须要被不同的经济单位承担。要稳定经济增长就要保证实体经济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市场的所有参与者都应按契约规则承担相应的风险成本, 从而获得新的生机。由于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和国有资本的经济地位, 政府理应承担经济结构调整所释放的相当大部分风险。然而, 上半年数据显示,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速达 10.6%, 大大高于同期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7.8% 的增速, 这意味着政府部门承担的风险实质上在减少。这就必然导致更多的风险被转嫁到企业和居民部门身上, 从而抑制了实体经济活力和居民消费意愿, 最终达不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的。

在结构性调整和去杠杆的过程中, 政府不能一边调整结构释放风险, 一边减少自己的风险承担。结构调整去掉的产能、挤掉的泡沫、去掉的杠杆在具体交易上就反映为各种财务成本和损耗, 仅由企业承担是不合理的, 企业也不可能有此动力; 在风险上就反映为结构调整造成增长速度“剪刀差”带来的风险成本。被转移出去的风险会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 在除政府外的各个经济单位间不断循环、传染、放大, 一旦超过经济和社会框架所能承受的底线, 触发全局性的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会逐步加大。

二、调控措施时空错配问题

在总的调控目标下, 各种经济调控政策和杠杆的运用其实各有各的功能, 在时间与空间的搭配上应发挥不同的作用, 而不是一哄而起, 把调控目标口号化、措施同质化, 监管功能在时空上一致发力, 结果货币政策与

济史上一个难得的最大的实验, 从这场实验当中我们自己来总结经验、提出新的理论。经济改革转型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方面的这种体制的改革, 我们作为经济学家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在政策研究的过程当中, 也同时要的理论创新。

我第三点看法是, 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不仅是要关心中国自己的事, 而且要关心世界。中国的崛起、民族的伟大复兴, 到底能不能被世界接受, 相当大的程度决定于中国的发展是不是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机遇。而这方面我们不仅要做, 同时也要会说。比如说现在中美关系, 大家在打贸易战, 可是我们知道贸易是双赢的。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有理有据地让美国学界、理论界、民众能够了解中国的发展、中美的贸易会促进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能够给美国的企业提供更大的利润空间, 这是互利双赢的。

同时, 现在 85% 的世界上的人口还生活在(在)发展中国家, 即使到 2025 年左右, 中国变成发达国家, 但到那时候还有 66% 的人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到现在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 到 2025 年左右又是一个高收入国家, 那我们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应该像)原来过去发达国家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样, 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但如果回顾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国际的发展跟合作的格局, 发达国家如果从钱上面来讲, 花了不少钱。根据我的统计, 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超过三万亿美元, 但是真正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 能够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国家非常少。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讲的思路决定出路。因为发达国家在提供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时候, 通常是沿着它们的理论、它们的思路、它们的经验来做的, 结果出发点非常好, 效果不如人意。

中国要承担更大责任

编者按

财政政策同时紧缩, 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同时从严, 中央与地方同时启动去杠杆, 使得各种政策与监管措施失去了配套调度和有效协调机制, 看起来热热闹闹, 各方呼应, 实际上已失分寸。当货币政策紧缩, 贯彻去泡沫去杠杆方针时, M2 已然从 15% 左右下降到历史低点 8% 左右, 财政政策理应更加积极。

所谓积极, 首先是积极减税。从上半年最新数据来看, 财政收入增速 14.4% 大幅高于同期经济增长增速 6.8%, 也高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 6.7%。这显示出减税仍有极大的空间。

其次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在过去的许多年, 20% 以上增长速度的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 而今年上半年基建投资增速放缓, 较 1—5 月下滑 2.1%。

第三是限制地方负债, 增加中央负债。财政部数据显示, 截止 2017 年底, 中央政府国债余额 13.48 万亿;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16.47 万亿。根据我们对债务拐点的研究, 中央政府负债并不存在着一个向下的拐点, 也即中央政府债务的继续上升, 仍能够带来对于 GDP 的显著正面影响。而地方政府债务拐点大概在 2014 年之前就已经达到了, 这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继续上升, 将会带来对于 GDP 更显著的负面影响。

当货币政策紧缩时, 企业融资渠道减少, 去杠杆任务加重, 这时候资本市场不应压缩而是应开放。

这同“严监管”并不相悖。但压缩直接融资规模并不是“严监管”的目的, 反而会造成流动性紧缺。须知增加资本充足正是去杠杆的重要措施。2018 年上半年所谓的第二次“违约潮”便与此相关, 短短半年间新增债券违约金额已高达 190 多亿。虽说债券违约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正常市场现象, 其本质是信用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但是大量债券在短期内集中违约, 风险释放过于密集风险承担又得不到有效落实, 这十分危险。

在经济结构调整期间, 各种经济政策的组合效能十分重要, 这需要强化顶层协调能力, 使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之间配合有度, 信贷市场、资本市场、产品市场运行

学术顾问: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全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园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葛志荣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李新泰 刘诗白 刘 伟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国有 张曙光 张晓仙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那么中国变成一个世界上的主要国家, 对世界上要承担更大的责任的时候, 我想应该的理论为什么过去的发展没有效果。因为从发展的角度, 你说这几年我们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 从农业到制造业到服务业, 从低收入水平到高收入水平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经验, 我们可以看到少数几个发展成功的发展经济体, 它们也有共同的特点。都是抓住国际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机遇期, 然后来抓住那个窗口机遇期, 让它们从农业社会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中国现在随着收入水平提高, 从制造业大国很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会直接输掉比较优势, 我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怎么向世界转移的窗口机遇期。当然, 要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必须有一些条件, 比如必须有基础设施的完善。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 2013 年以后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过去 18 年来我们讲的中非合作发展, 强调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 强调产能合作, 这确实是可以给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家的繁荣带来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期。当然, 它们要怎么抓住这个机遇期, 我们必须要有理论的指导, 就是怎么样来改变它们的发展思路的问题, 这也跟我前面讲的理论创新相关。

总的来讲, 在 1995 年的时候, 经济研究创刊 40 周年的时候, 我写的一篇文章当时提出, 21 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 21 世纪会是中国经济的世纪。我想的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作为经济学家, 一方面要继续贡献我们的智慧, 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化, 让我们的经济能够继续乘风破浪往前走, 同时提出新的理论, 才能够让我们的改革发展更顺当地进行; 并且以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路以及我们的发展来帮助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 也同样能给发达国家创造出的机会, 同样能够实现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时代到来。

编者按

平稳。各行其道, 难免混乱。

三、政策与市场衔接问题

当前政策措施通常存在这样的悖论: 企图规范市场行为反而干预了市场。其实质在于政策措施与市场之间缺乏衔接, 也缺乏打通政策与市场之间的有效桥梁。监管者都希望所有的市场行为能符合自己想象的状态, 并且整齐划一, 这实际上是不了解市场也不尊重市场的幼稚监管。在货币政策方面, 商业银行直接面向市场, 但监管部门掌握了投放规模、节奏和具体对象, 这就使得政策措施与市场之间容易脱节。金融监管无疑会影响银行的放贷能力和意愿, 进而影响货币乘数效果, 从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到市场的路径。近年来央行多次释放流动性, 但市场仍然感觉“钱荒”就是例证。金融“严监管”尤其是对表外业务的严格控制, 对银行的放贷行为和放贷能力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 企业的不断违约又使银行的放贷意愿大幅降低。也就是说银行虽然资金充裕, 由于严厉的金融监管, 资金并没有及时流出银行体系, 货币乘数效应未能有效发挥, 货币政策到市场的路径发生了堵塞。

金融监管的主题是搞清楚社会无人承担或者表面承担而实际上无人承担的风险总量和结构, 提前预警并设定适当的交易条件, 而不是盲目地限制各种金融交易。因此, 科学的监管是划定边界, 制定底线, 使这个边界和底线框架内的各种交易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状态, 才能够使监管与市场之间建立合理的互动关系, 才能处理好政策与市场的衔接问题。完全寄托于金融交易行为的“严监管”和动机的道德谴责, 并不符合市场监管的科学原理。目前这种以“行为监管”为主的监管模式应该向结构和边界监管模式转型, 在结构和边界框架内, 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在房地产问题上也存在类似现象。长期以来通过行政手段抑制需求和交易, 即限购, 客观上推高了房价。房价泡沫的形成同地方财政的扩张与缺乏廉租房等公共财政产品密切相关, 去泡沫要从根本上满足社会刚需, 也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套问题。

(下转 A4 版)